

推动以证据为本的教育政策研究

文 国际教师工会

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制定政策的方式改变了,而且政治决策过程也改变了。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政府非常强调“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前教育大臣 David Blunkett 在 2000 年时就说:“社会科学应该处于政策制定的核心。在政府和社会研究团体的关系上,我们需要革新——我们需要社会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决定什么政策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起作用,哪些类型的政策改革可能是最有效的。”

这种对证据为本政策的兴趣可以看做后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的一种方法,“证据”在决策中处于越来越中心、越来越明确的地位。其背后的假设是有研究支持的政策是更“有效的”(effective)政策。决定“什么起作用”的因素也正是这种有效性。

这种趋势加上全球化和新公共治理的发展,激发了对比较研究的关注,把比较研究作为提高效能和有效性的工具。政府需要证据来告诉他们“什么起作用”,OECD 等机构通过多边观察和评论、以及通过 PISA 等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搜集数据,开展评价,发现好的做法,向政府提供决策的“证据”和建议,在各国政策制定上起到了间接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只有有证据支持的信息才是有效的,正如 OECD 教育指标与分析部主任、PISA 秘书长 Andreas Schleicher 所说:“没有数据的支撑,你只不过是一个持有观点的普通人。”

PISA 是从 OECD 教育指标研究发展出来的。1990 年代中期,一些成员国要求“在学生知识和技能以及教育系统的成绩上有更加可靠的定期的数据”,这项指标研究产生了 PISA,现在代表了 OECD 在教育领域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PISA 的研究结果对参与国家和其他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政府和大众媒体双方的合力作用下,PISA 越来越普及。公众希望了解“教育怎么样了”,政府则希望向他们的选民证明“教育的进步”,而媒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起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所以 PISA 成了媒体的新闻热点。PISA 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而是当今“证据为本研究”趋势的一个例子,在 OECD 及许多国家的政策讨论中起了核心作用。

PISA 在引起公众对教育的关注上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媒体和政府对于 PISA 结果的关注过多集中在排名上,这点必须要引起注意。如果不加解释或不做具体分析的话,那么 PISA 结果很可能被用作很多不同的诠释,往往可以用来支持或者反对同一件事情,并且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也可能被异化为排名的竞争。因此各国在运用 PISA 提供的证据做政策选择时,一是要注意分析本国的经济文化背景,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和调整;二是要注意全面分析 PISA 所测评的学习结果,结合其他研究,从更丰富的内涵上来看待学生成绩、质量和公平问题。

——〔陆 璟摘译自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国际教师工会):Educatio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PISA 2006.〕

TUIDONGYIZHENGJUWEIBENDEJIAOYUZHENGCEYANJIU